

HONGXI ZHENGZHIL WENHUALUN

中

政治文化论丛

(第一辑)

主 编 马德普 副主编 高 建

西

ZHONGXI ZHENGZHIL WENHUALUNCONG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RENMINCHUBANSHE

D092-53
2003/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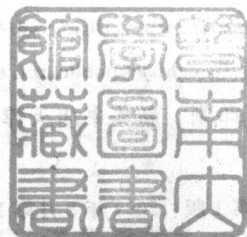
阅览室

中西政治文化论丛

(第一辑)

主 编 马德普

副主编 高 建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政治文化论丛/马德普主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1

ISBN 7-201-03712-9

I. 中… II. 马… III. 政治—文化—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IV. D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729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300020)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 插页 16 印张

字数:380 千字 印数:1-1,500

定价:26.00 元

编者的话

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中国史，是一部中西文化的碰撞史和融合史，也是一部伴随着剧痛和狂欢的新生史和复活史。这是告别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新生，是中华民族濒临衰竭的蓬勃创造力和生命力在新文明基础上的复活。当年，李大钊曾以这样的“再造”宏图来规划中国的新生：

“当知今日为世界再造之初，中华再造之始。吾人宜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门忏悔之功，遵耶教复活之义，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弃白首之我，迎青年之我；弃专制之我，迎立宪之我；俾再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李大钊：《民彝与政治》）

28岁的梁启超曾以这样激越的心情想象着新生中国复兴的活力：

她如“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

吸张。奇花初胎，萼萼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现在，现代化先驱们开创的中国“再造”或“新生”的伟业已传到我们这一代手中，曾创造过灿烂农业文明的中华民族的创造活力已开始复兴。历史证明，中国的再造如李大钊所讲首先是人的再造，也就是文化的再造；而这种再造也如他言是世界各种文化优秀成果的继承与借鉴、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和创新。中国复兴的活力就蕴藏在这种再造之中。我们创办这套论丛的宗旨，就是想为这一再造事业尽一点绵薄之力。

中华文化历来就有博大的包容精神，所谓“大德容众，大道容天下”就是明证。中华文化本身就有贵生贵新的基因，所谓“生生之谓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体现。正因为如此，中华文化才有强大的创造力和顽强的生命力。本论丛继承中华文化中的这些优秀传统，坚持科学、理性的态度，反对食古不化、食洋不化、固步自封等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倡导批判精神、创新精神和拿来主义的兼容并包精神，以中国的国情为出发点，以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为目的，继承借鉴中西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促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化和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为此，本论丛以中西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当代政治理论和政治文化现象的评介、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和政治理论的创新为主要内容，面向海内外的学界同仁，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探讨、争鸣、切磋的学术园地。热诚欢迎海内外同仁的支持和参与，以便共同努力，使这一园地硕果累累，百花争艳。

本论丛计划每年出版一辑,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本研究所长期致力于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是目前国内惟一以西方政治思想为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今年,恰逢我国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老前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所长涂大同先生从事高等教育 50 周年。为此,本辑论丛特收入先生几篇代表其主要学术观点的文章,和上海复旦大学浦兴祖教授跟随先生学习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心得体会的文章,以作为对中国教育界和政治学界这一盛事的庆贺。

编者

2000 年 10 月

目 录

庆祝中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老前辈徐大同先生	
从事高等教育五十周年	(1)
关于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浅见	
——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史的考察	徐大同 (3)
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	徐大同 (16)
重民与民主	徐大同 (30)
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几点思考	
——政治文化的多样性与政治文化的	
民族性	徐大同 (34)
邓小平关于民主和法制思想(教学大纲)	徐大同 (51)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线索	徐大同 (54)
原著为据 主题为经 政观为纬	
——学习徐大同先生研究西方政治	
思想史的方法论与基本学术观点	浦兴祖 (61)
全球伦理与 21 世纪儒学的发展	成中英 (93)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	
——兼论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区别	俞可平 (107)
漫话中国的国家干涉主义传统	许振洲 (124)
由《白虎通》看汉代的“天、王感应”	季乃礼 (139)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体意识流变	王乐理 (158)

新左派与自由派的争论及其得失	马德普(190)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百年历程	丛日云(214)
面向 21 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	高 建(242)
托马斯·霍布斯与作为纯粹虚拟人的	

国家	昆廷·斯金纳(252)
力与差异:斯宾诺莎的自由概念	苏珊·詹姆斯(300)
美国政治哲学中的社群主义	托马斯·伯格(333)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合理性?	史蒂文·卢克斯(355)
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	杨 龙(375)
世纪末的自由主义	吴春华(411)
解构总体:后现代“局部”政治论分析	常士阔(429)
略论尼采政治思想的反现代性质	仲崇盛(442)
自然法与天理	

——兼论不同政治文化中的政治

观念之比较	袁柏顺(461)
试论西方中世纪的自然法传统	黄 颂 姚韵红(471)
自由立宪与民主理论的创新	
——美国改革时代的宪政文化研究	佟德志(483)

庆祝中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

的老前辈徐大同先生从事

高等教育五十周年

旧作重刊说明：我自 1950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开始执教以来，至今整 50 年了；自 1952 年开始在原苏联专家谢米利亨等的指导下从事政治思想史的教研工作，至今也有 48 个年头了。由于受苏联专家要重视本民族文化历史的思想影响，从开始就在学习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同时，学习和关注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些为我后来由西方到中国到比较的学术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革”前的三十年我主要是奠定理论和专业基础，学术上无大成就。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随着政治学学科的恢复，随着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我自己也尤如新生，在教学和科研上都取得一些成果。

为了推动政治文化(包括中、西和比较)的研究，同仁们建议不定期地出版专业论文集。我多年未遂之心愿在一群中青年手中得以实现，确实心花怒放，由衷祝福这个《论丛》兴旺发达！此事由马德普教授主持，我想定能坚持办好，并会推动学科发展，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在《论丛》第一辑出版之际，马德普同志约我提供一些稿件。经考虑，遂把 1980 年以来二十年间几篇能体现我的学术思想的文章提交出来。这里有文章，也有大纲；有总体的，也有中国或西方的，也有比较的；有的发表过，也有的第一次面世。有的可能有些价值，有的则可能不成体统；有的可反映我的一贯看法，有的则可能有些发展和变化，有的甚至可能有些不妥。但总的来说可以看出我思想发展的脉络，今日发表出来供方家一晒。

徐大同

2000.10

关于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浅见

——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史的考察

□ 徐大同

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资产阶级伪科学”的重压下,被禁锢了将近三十年。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进一步发展,政治学的重建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提了出来。任何科学部门的建立和发展都必须与客观需要相适应,否则便没有生命力。因此,政治学的重建并不意味着“回复”过去的政治学,而是要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新的政治科学。无疑的,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建与发展,也必将要对加强和改善党对国家的领导,进一步处理好党政关系,加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设,发展与巩固社会主义民主,促进国家体制的改革,提高国家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的水平,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国家管理干部等方面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了使政治学沿着科学的方向发展,确定这门学科研究的对象、范围,应该是当前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目前也开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只想从政治学的历史沿革当中,中西对政治所涉及的范围的比较,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对政治科学的基本看法等方面作一些探索,谈一下自己对政治学研究对象、范围的粗浅看法,以供研究的参考。

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部门首先发生于西方。西方系统的政治学一般地说形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亚里士多德所著的《政治学》(POLITICS)则是第一部系统论述政治科学的著作。

古希腊是由许多独立的城邦(POLIS)所组成的。任何公民都必须是一个城邦的成员,不能离开城邦独立生活。各城邦虽然都是建立在奴隶占有制社会基础上,其政权的性质都是奴隶主阶级专政,但由于各自的具体条件不同,因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组织体制、管理形式。到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公元前 384 - 322 年),希腊的城邦制度正面临着分崩离析的严重危机。亚里士多德为了维护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他研究了 100 多种希腊的城邦组织,其目的则是要寻求一种解救希腊城邦制危机的途径。在这个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写出了他的名著《政治学》。从此,政治学便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在西方建立起来。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一词,是从城邦(POLIS)一词衍生而来,意思就是关于城邦的知识,是研究城邦问题的理论和技术。(参阅吴寿彭译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 1965 年版,第 110 页译注①)后来西方语言中政治学一词,也都是由此发展而来。如英语中的 POLITICS 就是 CITY(POLIS) + SCIENCE 所组成,意即关于国家的科学。

亚里士多德是从维护摇摇欲坠的希腊城邦制出发的,所以

他在《政治学》中首先提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即人天生（自然）要过城邦生活的命题。为此，他研究了城邦（国家）的产生、性质、目的、任务等基本理论原则问题。其次，他研究了各种形式的城邦，对国家的各种体制的组成，优劣比较以及其变革等问题作了深入、具体的研究。最后，他还提出了什么是最好的城邦生活，对理想的城邦构成、管理原则也都做了考虑、分析。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一书是以国家（城邦）为中心，具体解决关于国家的基本理论（产生、本质、目的、任务），国家体制的划分原则和分类等一般问题，以及如何建立、管理国家，即管理国家的实际问题。这种观点奠定了以后西方对政治科学的基本认识，确定了西方政治科学的对象，它一直影响到近、现代。（参阅吴恩裕《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自从亚里士多德以后，西方的政治学说一般地都是以国家问题作为中心。

西欧封建社会一切科学部门都是“神学的婢女”，政治学当然也要服从于神学，其中心内容主要是教权与王权谁应居于最高地位的争论。直到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成长才逐步改变了这种状况。

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是在反封建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为了争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权，资产阶级思想家逐步摆脱了神学，提出了新的政治观点。这时，“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所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6页）这个转变，在17、18世纪西欧各国的政治思想中都明确地反映出来。尽管当时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基本的政治观点却有一致之处。当时的政治理论是把国家法律看成决

定一切的东西,认为只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变革,一切问题也就都解决了。这样,当时的政治科学都是以人的自然权利和契约论为前提,以不同的方式论证为什么要设置政治权力——国家?人为什么要服从政治权力,以及为什么接受其对个人权力的限制、限制的度和范围如何?什么样的政治权力最能保证人的基本权利——自由、平等?这些观点,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适合自己需要的政权提供了理论。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科学的内容,主要是建立一套与中世纪神学不同的新观点,重新解决关于对国家的认识,关于国家体制和建立原则等方面的问题。

进入 19 世纪以后,西方各主要国家资本主义基础已经奠定,资产阶级已由争夺政权的阶级变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这时“政治已成为资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110 页)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确保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政治科学的主要任务,也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是在于如何维护资本主义“秩序”。这时,资产阶级开始抛弃革命时期的一些观点,从“理想主义”逐步进入“现实主义”。从着重于哲学的研究进而着重于实践的分析,政治科学也就着眼于对具体政治制度的改革。自从孔德以后,西方政治科学发展的总趋势就是把政治学与社会学紧密结合起来。奥地利的巩布洛维奇在《社会学与政治》一书中就说得比较明确。他说:“只有依据社会学,政治学才能成为实证的科学。”此后,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总的倾向是在于对政治现象进行“实证”的分析,即更注重新于对国家的实际政治活动的分析研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就曾说:“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任务,决不在于去判断国家一般应当是这样或那样的,它们应当去帮助制定政治的研究方法。

依靠这种方法,人们可以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和得到利益。”(《THE PUBLIC ENDITS PROBLEMS》)在现代,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更出现了所谓政治社会学、政治行为主义、现实主义政治学,等等。他们声称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在于记述“人的政治行为”, (G. GATLON: SYSTEMOTIE POLITICS)或认为“政治学的任务主要不在于提示政治的真理,而是解决实际的任务”。(MARGENTHAM: POWER OF POLITICAL CONCEPT)这样,他们就把政治科学从研究政治制度扩展到研究政治活动,从研究政权机构的活动扩大到研究各种政治团体的活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科学”,同时也认为从更广泛意义讲,政治学是研究“团体、组织和制度”的政治活动的科学。

总之,从19世纪中期以后直到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把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逐步由传统的研究国家的一般原因更加趋于研究政治实际活动,从一般研究国家问题到更加广泛地研究与政治活动有关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相互关系问题。然而我们也可看到,无论如何,西方现代政治科学所强调的仍然是研究两方面的问题,即所谓“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而其中中心自然是围绕着国家问题。(参阅米·波杜纳瓦茨《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这一点,仍然被认为是区分政治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键。

以上,我们并不是要研究西方政治科学的发展史,也不是要提示各种政治科学的内容与实质以及他们的历史作用,更不在于要具体地分析各种主张。通过这一概述,主要地是要说明在西方,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部门的政治学,其研究的对象一贯地是以国家问题为中心。只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情况,这门科学的具体范围也有所发展。这无疑地对我们确定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能有所启示。

二

中国古代社会对政治的理解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总的说来,自从夏商进入阶级社会直到近代以前,由于中国学术分科的不明确,政治学在中国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就不注重政治问题的研究,对政治就没有一定的认识、观点。恰恰相反,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来看,政治问题历来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从一定意义讲,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整个文化领域都非常关注政治问题,也即如何安邦治国问题。早在《书》、《诗》中,就有大量的论政的内容。《书》实即是一部政书。在《洪范》篇中就曾明确地提出了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等所谓“农用八政”,这实际就是维护统治权所必需的八件大事。及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与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政治问题就更成为各家各派的中心议题。司马谈在《六家要旨》中就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说明了诸子百家虽然观点不同,但其目的都是在于提出一套治理国家的方案。春秋战国时期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在以后长期封建社会中,思想家们也都无不在治理国家问题上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

中国与西方不同,自从国家产生以后,国家制度基本上是君主制;自秦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又成为基本国家制度。集权与分封,统一与割据虽然也有过斗争,但这不过是历史

上的一种例外,而且君主制本身也始终未变。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与西方不同,它主要不是解决如何组织国家问题,即建立何种形式的政体问题;而是要解决在君主的最高统治下,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治国之道”。荀况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彼国措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虽子之与也。”(荀子·王霸)这就是说国家问题主要是用什么方法和用什么人来治理国家。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特别注重如何在维护君权之下,处理好君臣、君民关系,即统治阶级内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便使封建统治长治久安。

基于以上情况,中国古代所谓的政治,首先就是指一种事务、管理而言。中国古代的政与治不是联用而结成一个词的。“政者事也”,是指事务而言,而“治者理也”,则是指的管理。但是,从二者的含意看,总是相通的。所以,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就包含有政治行动的意思,是一种“动态的”。有谓:“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礼记·促尼燕居》)也正因如此,中国古代讲“政”总是说“为政”、“从政”,而且“为政”与“治国”相当。如《说苑·建本篇》中引称:“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国之本也。”至于把政治联用乃是近代的事。直到孙中山讲:“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61页])也还带有中国对政治了解的特色。

中国古代对政治既然作为一种事务理解,实际上则是指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而言。也即所谓“政者制也”。这就是说,把政治是看成一种行为准绳,使被统治者有所遵循。所以说“政”就是“使不正归于正”,就是所谓“下所取正也”。特别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君主掌有最高统治权,就更使得在中国古代政、